

# 评吴易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

丁 冰

近二三十年来,无论国外还是国内,经济学术思想都呈现出战后最活跃的局面。一方面,在 20 世纪 70 年代西方经济“滞胀”的冲击下,形形色色的新自由主义思潮纷纷涌现,国家干预主义与自由主义之争十分激烈;另一方面,在我国,随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低潮的到来,应当进行怎样的改革,以及马克思主义是否已经过时的争论,也在如火如荼地进行。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深有研究的著名的经济学家吴易风教授,坚定地站在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立场上,冷静地观察和积极参与这场论战,写出了大量脍炙人口的论著,闪耀出经济学新的光辉。最近,经济科学出版社精选出其中有代表性的论文 39 篇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的书名出版,以飨读者,实在是我国经济学界的一件幸事。

该书分为三个部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西方经济学研究、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研究,每个部分的研究都不仅很有深度和精辟的创新见解,而且都是有的放矢,是非分明,掷地有声。

一、关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本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之博大精深和科学严谨,以及对人类历史进程所产生的深刻而巨大的影响,已为史实所证,有目共睹。但近些年来,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处于低潮的情况下,有些同志自觉不自觉地对之产生了疑虑。有的人甚至认为那已是过时的教条,应以西方经济学取而代之;或者企图把这两种经济学融合起来,鱼目混珠,最终达到“取而代之”的目的。在书中,吴易风教授针锋相对地,通过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研究对象、观点、方法的分析,深刻揭示出这两种经济学的原则区别,不容混淆。并指出,无数事实证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不仅没有“过时”,而且从根本上说还要比西方经济学高明得多。如对当前国内被炒得十分火爆的科斯产权理论,吴易风教授高度藐视地指出:“岂不知早在科斯以前一百多年,马克思就创立了科学的、系统的产权理论。”就流行的西方增长理论而言,也“正是马克思第一个把静态分析动态化,把短期分析长期化,提出了系统的科学的经济增长理论,建立了经济增长模型”。吴易风教授还针对某些夸耀西方经济学研究资源配置比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所研究的生产关系对社会主义建设更为有用的观点时说:“在研究对象问题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的根本分歧不在于要不要研究资源配置,而在于:(1)要不要研究生产方式;(2)要不要研究与生产方式相适应的生产关系;(3)要不要区分抽象的生产一般的资源配

置和具体的生产方式的资源配置,以及要不要研究具体的特定生产方式的资源配置。在所有这些问题,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回答都是肯定的,西方经济学的回答都是否定的。”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国内当前争论最大的劳动价值论问题,吴易风教授也作了全面、系统、深刻的分析和充分的肯定,并对新知识、新科技是否创造价值的前沿问题,进行了创造性的分析和很有说服力的科学回答,从而在深化劳动价值论的认识中,作出了既坚持又发展的可贵贡献。

二、关于“西方经济学研究”。作者一开头就系统地论述了西方经济学的性质、源流和方法,以及我们应有的态度,用墨不多却内涵丰富,给读者如何正确看待西方经济学以鲜明的指导思想。接着又明确指出,西方经济学史,从一个特定侧面来看,就是一部经济自由主义和国家干预主义论战的历史。同时即以此为线索,从重商主义到新凯恩斯主义,系统而简明地阐述了西方经济学三四百年来的形成、发展和演变的历程,而着重于阐明当前新古典宏观经济学与新凯恩斯主义之争,精辟地分析了两派不同的理论、政策和周期模型,并且十分准确地指出:市场出清还是非市场出清,政府失灵还是市场失灵,政策无效还是有效,是这两派理论观点和政策主张分歧的关键所在;争论的实质在于如何看待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并认为,在这个问题上,新古典学派理想主义超越了现实感,新凯恩斯学派则较少沉湎于理想主义而较多地面对资本主义现实。又说,一般地讲,资本主义比较稳定的时候,自由主义容易被接受;而当经济危机和失业十分严重的时候,政府干预的理论、政策往往会得到大量的拥护者。我认为这乃是作者对西方经济学争论的历史和现状的高度概括和科学总结。

该书对当前西方经济学值得注意的三个新动向也给予相当深刻而科学的分析和评价:一是随着高科技发展而兴起的新经济增长理论。作者认为:“新增长理论像新古典增长理论一样,只是对经济现实的一种‘寓言式’的解释,并不是一种科学的理论。”二是对经济全球化的性质和利弊得失的各种观点的研究分析。作者认为,作为社会主义国家,面对全球化,既要有机遇感,更要有危机感,如果一味迎合全球化,“傍美国这个大款”则是错误的。三是数学化的倾向。作者充分肯定数学是辅助经济理论研究的一个很有益的方法,并且身体力行,除在研究西方经济学中大量使用数学方法外,还力图使之运用于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分析与研究中。如书中对以劳动价值论为基础的生产函数分析(下转第 128 页)

60年代中国货币理论工作者对一般理论、货币流通理论的研究,而且更多地涉及到改革开放后关于金融体制改革中的“难点”和“热点”问题——通货膨胀和货币政策的理论研究。

这些研究,不仅对货币思想史理论本身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而且对于当今中国金融所面临的新情况、新变化、新挑战,对于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金融改革之路,既具有直接的实践意义,又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

4. 该书研究的内容,尤其是它所揭示的近现代关于货币流通的普遍规律和实际经验教训给中国和其他第三世界国家进行货币金融体制改革以重要启迪,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鸦片战争以后,外国银行很快进入中国。1845年,英商丽如银行就在香港设立分行。进入19世纪90年代以后,德、日、俄、法、美等国相继在中国设立银行。在1890-1902年的12年间,德国的德华银行、日本的横滨正金银行、俄国的华俄国道胜银行、法国的东方会理银行和美国的花旗银行相继设立,加上原有已存在多年的英国汇丰银行,形成列强并存的局面。外国在中国设立的银行,未经中国政府许可,即擅自发行货币。外国银行在中国发行货币,一方面侵占了中国货币市场,另一方面阻碍了整理币制的实施。加之帝国主义在华势力对我国整理币制动议的直接干涉,几乎使得此项工作无法开展。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后,银行业也要在5年之内分3个阶段对外开放,届时中国银行业将面临激烈的挑战和冲击,如何应对这一局面,防止国际金融势力对中国金融业的操纵,牢牢掌握金融控制权,提高银行自身的竞争力是一条途径,而政府得力的金融货币政策、有意识的防范也很重要。

5. 《中国货币思想史》一书凝结了四代学人心血,是集体团结、合作的产物。从20世纪70年代到1991年,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的侯厚吉教授搜集了200万字的资料,为该书的写作奠定了扎实的基础;1991年,在生命垂危之际,侯老在自挽

联中留下了“回头应有感,遗篇犹待后归册”的遗嘱,并把全部资料、手稿交给了课题组。主编张家骥教授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几乎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撰写该书,主要负责设计全书体系框架,拟定卷、编、章、节大纲,提出各章节写作要求,并对初稿进行了审读和改定。作为第三代学者的万安培、邹进文博士,既有比较扎实的史学基础,又有较高的经济学素养,为完成该书写作付出了艰辛劳动。该书第四代学者为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经济思想史专业的硕士生,他们攻读硕士学位期间把货币思想史作为主攻方向,他们思想活跃,提出了很多有创意的新观点。以往出版的有关著作,均为个人或基本上是个人的专著。个人的精力终归有限,该书是一个良好学术团体集体努力的成果,发挥了集体的优势,发掘了大量前人所未曾利用的史料。如唐代反映货币拜物教思想的作品《钱本草》;清代蔡之定的《为述古裕今敬陈管见》的行钞议论;民国时期黄宪章的《货币学总论》等。

总之,该书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以马克思主义的货币理论为基本工具,又吸取了当代国内外货币理论研究的新成果。作者始终着眼于中国货币理论积累和发展的过程,由此揭示其规律和特色;始终着眼于中国货币理论在世界货币理论中的地位,指明中国货币理论在世界货币理论发展史上长期领先和长期落后的原因;始终着眼于货币理论的发展渊源及货币理论的发展是围绕各个历史时期货币问题而展开的,明确提出各个历史时期货币理论研究和讨论的焦点、热点;始终着眼于总结历史经验教训,为现实提供借鉴。该书不仅是货币理论史的一大贡献,也必将对现实的货币理论研究、教学和货币工作起重要的作用。

(作者单位:湖北人民出版社 武汉 430022)

(责任编辑: N)

(上接第126页)就是一个有益的成功尝试。但作者又强调指出,不可滥用数学,因为现在滥用数学已成为西方经济学研究中的一个严重问题,以致一些西方学者也不得不为之“提出严重警告”。

三、关于“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研究”。该书围绕着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经济学界在如何建立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个中心问题上的分歧,展开了一系列深入的研究,作者坚决抵制西方新自由主义思潮对我国经济改革事业的侵蚀,准确地把我国经济理论界在市场经济理论问题上存在的主要分歧归结为:关于市场经济和基本经济制度的关系、关于所有制、关于分配制度、关于市场机制和宏观调控的关系等四个方面的问题,而这些问题又是和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理论紧密联系在一起。经济学界有的人认为“经济学的基础理论本身具有普遍的、一般的科学意义,是无国界的、无‘阶段性’、无‘阶级性’的”,因此“不应该有中国特色的基础理论”。吴易风教授旁征博引,以大量事实为依据,坚决驳斥了这种违反基本科学常识、违反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观点,充分论证了我国当前必须坚持以生产资料社会主义公有

制为主体,同时允许和鼓励个人、私营、外资等非公有制经济适当发展,使之成为社会主义经济的必要补充,反对私有化的主张,或在“非国有化”、“民营化”等各种名义下搞变相的私有化。

前车之鉴,后者之师。书中还收入了作者1995年访俄报告——《俄罗斯经济学家谈俄罗斯和中国经济问题》,俄国学者在文中反思了苏联解体的沉痛教训,并提出了中国改革要以俄为鉴的观点,十分符合我国人民的心愿。因此该文在1995年公开发表后,曾引起学术界的强烈反响和普遍赞扬。这一事实进一步证明作者的上述观点是完全正确的。

注释:

吴易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91、181、18、321、322、362、435、254、441页,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0。

(作者单位:首都经济贸易大学 北京 100026)

(责任编辑: N)